

省的农民。由于闽粤地区很早就有海运贸易和对外接触，所以也提供了许多出洋所需要的中介关系。他们大部分人的目的地是东南亚，但由于香港和澳门都是国际港口，这也便利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民可以远涉到遥远的澳洲、檀香山和美洲。因此，来自这一地区的移民散布得最广。

第二节 容闳和他的《西学东渐记》

容闳（1828—1912），原名光照，族名达萌，号纯甫。香山南屏乡（今珠海）人。1841年入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。1847年随校长塞缪尔·布朗赴美，入孟松学校及耶鲁大学，1854年毕业，为“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”者。1855年返国，先后在香港高等审判厅、上海海关等处任职，并一度经商。1860年赴太平天国天京（今南京）参观，向洪仁玕提出实行新政的六项建议。1863年入曾国藩幕，为筹建江南制造局，赴美购买机器。其间，多次向清廷提出选派青少年赴美留学，以振国势。1872—1875年受命主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，任留美学生监督，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先河。1875年兼任驻美国、西班牙、秘鲁副公使。1895年返国后，又多次向清廷提出改革的新方案。1898年参加维新变法运动，戊戌政变发生后逃离北京。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主持的张园会议，被推为“中国国会”会长，旋因清廷通缉而逃往香港，途中结识孙中山。1902年再度赴美，居美期间积极支持同盟会的革命事业。1912年4月21日病逝于美国寓所。著有《西学东渐记》等。

《西学东渐记》写于容闳的晚年，是用英文写的自传式的回忆录，英文原名为 *My Life in China & America*，直译为“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”。英文版于1909年在纽约出版。后由徐凤石、恽铁樵两人节译为中文，改名为《西学东渐记》。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按旧译本校点重印。全书共分二十二章，起自1828年，终于1901年。第一、第二章写他的幼稚时代和小学时代；第三章至第五章写他在美国留学；第六章以后，写他学成回国，入世谋生。自述其经历太平天国运动、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和生平从事教育、政治、经济等活动。《西学东渐记》可说是第一个留美毕业的学者叙述他在中国和美国生活的著述。其中记述早期我国留美学生的学习生活，较为形象、详尽。如写当初决定赴美的情形：

一八四六年冬，勃朗先生回国。去之前四月，先生以此意布告生徒，略谓已与家属均身体羸弱，拟暂时离华，庶儿迁地为良。并谓对于本校，感情甚深，此次归国，极愿携三五旧徒，同赴新大陆，俾受完全之教育，诸生中如有愿意同行者，可即起立。全堂学生聆甚言，爽然如有所失，默不发声。其后数日间，课余之暇，聚谈及此，每为之愀然不乐。其欣然有喜色者，惟愿与赴美之数人耳，即黄胜、黄宽与予是也。当勃先生布告游美方针时，予首先起立，次黄胜，次黄宽。第予等虽有此意，然年幼无能自主。归白诸母，母意颇不乐。予再四请行，乃勉强曰：“诺。”然已凄然泪下矣。予见状，意良不忍，竭力劝慰之曰：“儿虽远去，尚有兄弟与姐三人，且长兄行将娶妇，得有兄嫂承欢膝下，不致寂

寞。母其善珍摄，弗念儿也。”母闻予言，为之首肯。由今思之，殆望予成器，勉强忍痛也。呜呼！

一位渴望远涉重洋赴美求学的青年形象重现在读者面前。当听到勃朗先生说愿携三五旧徒赴美继续学习时，他第一个站起来响应。当母亲听说赴美的消息后“颇不乐”，他也不忍心，但仍“竭力劝慰之”，并终于得到母亲的“首肯”。

第一次远涉重洋，不少人都是怀抱无奈和恐惧的心情，而容闳“不特无恐怖之念，且转以为乐”。且看他于1847年1月4日乘帆船西行的情形：

时值东北风大作，解缆扬帆，自黄浦抵圣希利那岛(St. Helena)，波平船稳。过好望角，小有风浪，自船后来，势乃至猛，恍若恶魔之逐人。入夜天则黑暗，浓云如幕，不漏星斗。于此茫茫黑夜中，仰望桅上电灯星星，摇荡空际，飘忽不定，有若圩墓间之磷火。此种愁惨景象，印入脑际，迄今犹历历在目。惟彼时予年尚幼，不自知其危险，故虽扁舟颠簸于惊涛骇浪中，不特无恐怖之念，且转以为乐，竟若此波涛汹涌，入予目中，皆成为不世之奇观者。

经过了98日的舟中生活，到达了纽约。在纽约，“为日无多。于此新世界中第一次所遇之良友，为巴脱拉脱夫妇(Mr. and Mrs. Davia E. Bartlett)。巴君时在纽约聋哑学校教授，后乃迁于哈特福德，仍为同类之事业。今巴君已于一八七九年逝世，其夫人居孀约三十年，于一九〇七年春间亦溘然长逝矣。”对于巴夫人，容闳曾在书中评论说：“巴夫人之为人，品格高

尚，有足令人敬爱。其宗教之信仰尤诚笃，本其慈善之怀，常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，皆为巴夫人教育而成有用之材。故巴夫人者，予美国良友之一也。”

在美游学，容闳得到美国友人的关照和支持，一切都较顺利。他回忆在孟松学校就读时的寄居生活，写道：

方予游学美国时，生活程度不若今日之高。学生贫乏者，稍稍为人工作，即不难得学费。尚忆彼时膳宿、燃料、洗衣等费，每星期苟得一元二角五之美金，足以支付一切。惟居室之洒扫拂拭，及冬令炽炭于炉，劈柴、生火诸琐事，须自为之。然予甚乐此，藉以运动筋脉，流通血液，实健身良法也。予等寓处去校约半英里，每日往返三次，虽严寒雪深三尺，亦必徒步。如此长日运动，胃乃大健，食量兼人。

按照孟松学校的规定，每年都有一定的名额资送大学，但受资送的人，必须先具志愿书，毕业后愿充当传道的教士。容闳不愿毕业后当教士，决然不向孟松学校请求。而该校校董却召他面议资送入学之事。对于此事，他在第五章《大学时代》中写道：

此在校董一方面，固对予极抱热诚。而予之对此等条件，则不轻诺。予虽贫，自由所固有。他日竟学，无论何业，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，纵政府不录用，不必遂大有为，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，以竟吾素志。若限于一业，则范围甚狭，有用之身，必致无用。且传道固佳，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。以吾国幅员若是其辽阔，人苟具有真正之宗教精神，

何往而不利。然中国国民信仰果如何者？在信力薄弱之人，其然诺将如春冰之遇旭日，不以消灭，谁能禁之。况志愿书一经签字，即动受拘束，将来虽有良好机会，可为中国谋利者，亦必形格势禁，坐视失之乎。余既有此意，以为始基宜慎，则对于校董诸人之盛意，宁抱歉衷，不得不婉辞谢之。嗣海门悉予意，深表同情。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，决不能以食贫故，遽变宗旨也。

由此可见，容闳赴美留学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利，决不能因贫而改变初衷。由于他拒绝了毕业后当传教士的要求，他同那些慈善基金一刀两断，没有了金钱收入，只好靠半工半读来完成学业。他在回忆耶鲁大学的生活时写道：

余之入耶路大学，虽尚无不及格之学科，然在教室授课，辄觉预备工夫实为未足，以故备形困难。盖一方面须筹画经费，使无缺乏之虞；一方面又须致力所业，以冀不落人后也。尚忆在第一年级时，读书恒至夜半，日间亦无晷为游戏运动。坐是体魄日就羸弱，曾因精力不支，请假赴东温若休息一星期，及能继续求学焉。

第二学年之末及第三学年，学费渐充裕。以校中有二三年级学生约二十人，结为一会，共屋而居，另倩一人为之司饮膳。予竭力经营，获充是职。晨则为之购办蔬肴，饭则为之供应左右，后此二年中予之膳费，盖皆取给于此。虽所获无多，不无小补。萨伐那妇女会既助予以常年经费，阿立芬公司亦有特捐相助。此外予更得一职，为兄弟会管理书籍。兄弟会者，校中两辩驳会之一也。会有一小藏书楼，予以会员之资格，得

与是选，博微资焉。

第四学年，兄弟会中仍举予为司书人，每岁酬予美金三十元。予既得此数项进款，客囊乃觉稍裕，不复以举债为生。若例以小村落中之牧师，每年薪俸所入，亦不过二三百金。彼且以赡养八口之家而无缺乏，则予以个人而有此，又有妇女会赠予以袜履等物，更不必自耗囊金。

通过半工半读和妇女会的捐赠，容闳解决了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用，并顺利地于1854年获得毕业。

毕业后何去何从？一是留在美国，一是回国。对此问题，容闳在第四学年尚未毕业之时，“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，规画大略于胸中矣”。他认为自己“既受此文明之教育，则当使后予之人，亦享此同等之利益。以西方之学术，灌输于中国，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”。他回国后，向太平天国提政治建议，筹办江南制造局，组织中国留学生出洋，参加维新变法运动，同情和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等，都“以此为标准，专心致志以为之。”

《西学东渐记》的第十九章，《留学事务所之终局》，记述了我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洋赴美留学的始末，详细说明了留美学生撤回中国的原因和经过。

该书以时间为经，以事件为纬，夹叙夹议，笔锋饱含热爱祖国、热爱同胞之情。它通过作者对自己在中国和美国生活的追忆，反映了早期留美学生的情况，以及一位著名华侨学者的际遇。